

自我与文化

——关于文化在 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德) 卜松山

作者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

关键词 文化 诗歌 主体性 回归文化

提要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80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80年代中国知识界展开的种种讨论,其特征是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如下两个中心题目:“自我”(即“主体性”)与“文化”^①。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这两个题目颇具震撼力。文革时,意识形态决定一切,它只承认人们的阶级属性;同时,人们还试图摆脱传统,建构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鉴于这一历史条件,人们既无空间也无兴趣去探究那些官方规范之外的领域,诸如自我的、超自我的或传统的东西。所以,等到“解放思想”的信号发出后,自我和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即成为热点,后来两者演变成一种话语:就是自我“回归文化”^②。

自我的发现标志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那时,一代新诗人试图摆脱政治羁绊,他们“抒发自我”的语言虽然藏在“朦胧”意象之后,但仍然清晰可见。在个人的自我中同时还闪耀着普遍人性的特征。80年代中期,当“寻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时,诗坛兴起了一阵“史诗”的热潮。之后,“非非派”和“他们”为标志的新诗派,既抛弃了朦胧隐喻掩盖下的自我表现,又有悖于文化激情和爱国主义诗风。

新诗发展的脉络大抵如此,但总是有一些诗人和诗作难以完全纳入这一框架,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为此,我将就自我与文化这层关系来讨论以下三首诗:女诗人李小雨的《敦煌》^③,杨炼的《飞天》^④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⑤。我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空间,它具有包括神话、宗教、艺术、历史和价值体系在内的特定传统特色。克利夫德·盖尔茨认为,文化乃是“历史流传下来的、象征意义的范式”,它是“传统观念的体系,它表现在

象征的形式语言中，人们借助这一语言产生、传递并记载下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要讨论的三首诗的主题均有深远的文化历史背景，写的是佛教圣地，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为“史诗”，把它们归入“名胜诗”、“观光诗”、“观物诗”甚至“边塞诗”这一类的范畴似更确切一些。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我想在最后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简略谈一些看法。

敦 煌
李小雨

在那一片流沙的下午
梵文铺满戈壁的下午
白莲花为我而开

千莲怒放
有佛微微张目
有菩萨，半裸的深情的
有弥勒用各种坐姿
有九色鹿用摩尼宝珠
都为我讲
莲的故事
我的心便化为飞天了
那风便清凉凉的
那洞窟便渺远
那世界便淡而又淡
那檀香
那管弦

从三危山上俯瞰人生
该见一种什么境界呢
璎珞、卷草、垂慢的
神秘曲线啊

更醉我把一粒粒的
本生故事
都穿成念珠
醉我以双耳听禅
醉我的肉体
生在东方
幻想
长在东方
灵魂
不灭在东方
醉我在你的胸廓里
寻找那一片逝水
睡成水中央的
那一朵莲

然而我的黑发
却贪恋洞窟外的斜阳
不知为什么
在千佛的指上
却越剪越长
越理越乱

这首诗写于 1985 年，从风格上看，类似“观光诗”或“名胜诗”。抒情我在某个下午面对边塞景观（具体地理位置是戈壁绿洲敦煌及邻近的三危山），生发出各种联想。第二段第三段分别罗列了众多的游历印象：在佛教圣地抒情我触景生情，身心溶化在宗教氛围之中：“我的心便化为飞天了”，化为洞窟壁上长袖舒卷、衣带飘飘的散花天女。第三段中“醉我”一词重复出现了四次，高度表现了佛教（艺术）的魅力——肉体、精神（幻想）、灵魂与敦煌所体现的东方文化传统融为一体：“醉我的肉体 生在东方 幻想 长在东方 灵魂 不灭在东方”。值得注意的是，沉醉的抒情我一反佛教传统，他在中国，在东方文化中而不是在西天乐土寻找再生或永生。当然，宗教传统——马克思视之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引发的沉醉在最后一

段有所淡化，甚至部分已被撤回。诗末抒情我的黑发——通常泛指中国人——贪恋起洞窟外的人间烟火，但他经历的佛境魅力显然是无法彻底摆脱的。“越剪越长”、“越理越乱”中的“剪”暗示着剪断历史和传统文化，“理”则暗示现代理性梳爬，这两种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乱”亦即宗教的非理性，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越理越乱。

归结到自我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两者处于互相吸引的紧张关系之中。敦煌这个地方对自我有某种精神诱力，它使自我沉醉并融入东方文化。同时，自我却努力与它保持距离，但这一努力最后又打了折扣，因为彻底的疏离是不可能的。总之，自我与文化虽然有一定距离，但仍是连在一起的。

飞 天
杨 炼

我不是鸟，当天空急速地向后崩溃
一片黑色的海，我不是鱼
身影陷入某一瞬间，某一点
我飞翔，还是静止
超越，还是临终挣扎
升，或者降（同样轻盈的姿势）
朝千年之下，千年之上？

全部经历不过这堵又冷又湿的墙
诞辰和末日，整夜哭泣
沙漠那麻醉剂的咸味
充满一个默默无言的女人
一小块贞操似的茫然的净土
褪色的星辰，东方的神秘

花曲摇摇欲坠
表演者应有的温柔

醒来，还是即将睡去？我微合的双眼
在几乎无限的时间尽头扩张，望穿恶梦
一种习惯，为期待弹琴
一层擦不掉的笑容，早已生锈
苔藓像另一幅壁画悄悄腐烂
我憎恨黑暗，却不得不跟随黑暗
夜来临。夜，整个世界

现实之手，扼住想象的鲜艳的裂痕

歌唱，在这儿
是年轻力壮的苍蝇的特长

人群流过，我被那些我看着
在自己脚下、自己头上，变换一千重面孔
千度沧桑无奈石窟一动不动的寂寞
庞大的实体，还是精致的虚无
生，还是死——我像一只摆停在天地之间
舞蹈的灵魂，锤成薄片
在这一点，这一片刻，在到处，在永恒

一根飘带因太久地垂落失去深度
太久了，面前和背后那一片茫茫黄土
我萌芽，还是与少女们的尸骨对话
和一种墓穴间发黑的语言
一个颤栗的孤独，彼此触摸

没有方向，也似乎有一切方向
渴望朝四周激越，又退回这无情的宁静
苦苦漂泊，自足只是我的轮廓
千年以下，千年以上
我飞如鸟，到视线之外聆听之外
我坠如鱼，张着嘴，无声无息

飞天在李小雨诗中只是一个母题——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母题，因为抒情我的心化为飞天了。而在杨炼笔下，飞天却是明确的主题，而且成了抒情我自己。这里写的不再是转化或是

对飞天若即若离的神往，而是自我和对象的融合：抒情我简直就是壁画上飞天之灵。飞天游移在千年之下，千年之上，杨炼这首诗是对她谜一般不确定的“本质”的思考。所以，全诗贯串着飘忽不定的多义性。诗中没有明确无疑的断言，多的是“既是又是”、“又是又不是”这类话。如《飞天》始于否定：“我不是鸟”，“我不是鱼”；却终于肯定，虽则是隐喻层次上的肯定：“我飞如鸟”，“我坠如鱼”。对立背后的统一可以说是这首诗深层的主题，即“东方的神秘”，而飞天则是东方神秘的艺术体现：“庞大的实体，还是精致的虚无/生，还是死——我像一只摆停在天地之间/舞蹈的灵魂，锤成薄片/在这一点，这一片刻，在到处，在永恒”。

作为“片刻”与“永恒”、“一点”与“到处”的统一体，飞天未尝不是暗喻人生之谜：人作为个人是有限的，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又是无限的，所以也就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于是，飞天变成每个凝视它的自我——变成人流中的“一千种面孔”。这种整体观照及无限和有限的揉合使这首诗超越了佛教特有的内涵，带有某种神秘色彩。

现在，回到自我与文化这个题目。这首诗里找不到独立的、有距离感的自我。这和归到屈原名下的《楚辞》中的某些篇章（如《东君》）相似，自我成了讨论的对象，主题与客体融为一体。“从内心写出”^⑥对象的手法，使人联想到里尔克的咏物诗，如《豹》。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虽然此处有言说者的我，但重要的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第三节）。这同李小雨诗里的“有我之境”恰好相反。飞天作为抒情我原本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代表具有佛教传统及其中国传统特色的东方文化。但自我的超时间性——“千年之下，千年之上”，“诞辰和末日”——及其处所的不确定性——“没有去向，也似乎有一切方向”——又使自我超越特定的“东方文化”。飞天作为可感知的“永恒与时间的交点”（艾略特语，见《四个四重奏》）成了传统和现代的交点，成了中国文化和人类生存条件（condition humaine）的交点。由此可见，这首以中国宗教文化遗迹为题材的诗暗示着文化的开放性，甚至精神的普遍性。

有关大雁塔

韩 东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韩东《有关大雁塔》一诗大约写于1982—1984年^⑦，很可能有感于杨炼的《大雁塔》

(1980—1981)组诗而作。杨炼这一组诗标志着80年代初“史诗”的一个高潮。《大雁塔》和《飞天》手法类似,抒情我就是诗歌的对象大雁塔。然而,诗中历数民族悲剧,对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流露出激昂的历史情怀,这是《大雁塔》与《飞天》及其所属组诗《敦煌》明显不同之处。

韩东的诗和杨炼的截然相反。众所周知,韩东的作品被归为反朦胧诗的“他们派”。Shang Zhongmin把反朦胧诗倾向归结为:1.反智反激情的态度;2.取消意象和比喻,采用直接而简单的表达方式;3.描述冷静,有距离感^⑧。这些特点都可以在这首诗里得到印证;参照杨炼的《大雁塔》则更为明显。“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开首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大白话;接下来作者以幼稚而不怎么文雅的笔调写那些“不得意”和“发福”的游客来来去去,想爬上塔去做一做英雄。尽管诗里表现出一派稚拙,尽管佛教圣地或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被世俗化了,但意在言外:诗以塔为线索展现出一个嘈杂喧闹的物质化了的世界,毫无精神和历史感可言,从而间接揭示了精神的空虚。这是千部一腔的乏味,有别于文革时的乏味,因为它源于商业化和庸俗化^⑨。如果说讽刺是用来提醒缺乏或缺陷的修辞手段,那么,诗里四次提到所谓英雄,就颇具讽刺意味:一是对杨炼诗中的历史豪情的讽刺,二是对现实的讽刺。讽刺凸显出可能性与现实之间、可能的历史意识和实际的无历史感、无面目感之间的紧张。

这种讽刺也揭示了自我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诗中的“我们”与自己的文化只有种冷嘲的关系——“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失去根的“我们”反映了庸庸碌碌、无法用文化来规范的现代生活;此外“我们”与文化的隔膜,即与大雁塔这一古老精神世界象征的隔阂,间接点出对文化定向的追求:追求比爬爬佛塔更有意义的东西。

撇开前面讨论过的三首诗,再看自我和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到底关系如何(下面的简述主要是受到查理·泰勒《现代的困扰》一书的启发^⑩)。现代的标志是自我从决定一切的宗教、政治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始于西方,我们且把它视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演变。到了中国,主体化进程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只消回顾一下文革中的大众文化和个人崇拜,就很清楚了。当然,现代化不只具有正面意义。它的两重性在现今西方变得日益明显,这表现在社会不断地化整为零(Atomisierung),以及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活空间越来越不负责任这些方面。失落了意义的“荒原”正在全球扩大。在自由经济主导下,个性的解放与拼命攫取最高利润的规律灾难性地结合在一起,我们面临的全球性趋向是,人们只顾追求个人的眼前利益,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经济化。很多人认为,这些是现代人获得自决、满足物质需要应付的代价,确实也有人乐于付出这个代价。但是,从全球角度推算一下,现代化光是对生态的破坏就足以触目惊心的了。

人们既要维护个性解放这好的一面,又要杜绝现代化带来的毁坏性后果。鉴于这一两难处境,反省人与整个生存空间的关系及对它的责任,将越来越重要。沿用盖尔茨(Geertz)对文化的定义,文化乃是自我的土壤,是精神和物质生存空间,拥有价值体系和来自传统的“象征性资源”(杜维明语),它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社会裁判(巴尔鲁文 Barloewen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可以当作一个基准点和重新定向的坐标。

至于诗歌,前现代诗人——无论是中国唐代人还是欧洲浪漫派诗人——都还有“人与自然的情景交融”^⑪,也就是说,自我与自然(自我之外的秩序)密切相关。到了现代派那里,以纯粹个性化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孤绝的自我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导致了自我与自然的决裂。尽

管如此，现代派尤其是早期现代派的经典诗人（如里尔克、庞德、艾略特）虽然深切感受到了“形而上的无家可归”，却仍然孜孜地寻找自我之外的秩序，也就是说从文化传统这一“象征性资源”中汲取养分。

上文讨论的诗作和诗人也应该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和评价。这三首诗显然也同样是探寻自我之外的世界。传统的佛教世界已经遥远而陌生了，但它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人们对它仍然有着强烈的亲近感。如今，商业化和庸俗化的生活方式在全球急速蔓延（韩东诗里的嘲讽正是这一现象），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至少以艺术手段——来弥补现代化带来的意义失落。对这个问题泰勒这样写道^⑩：

当公共秩序赋予人们的整体感失落后，
似应以更为强烈、更为内在的和衷共
济精神来弥补它。也许这正是大部分
现代诗歌试图传达的信息。当今，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比这种传达更迫切的了。

注 释：

- ①② Tongqi Lin, “A Search for China’s Soul”《寻找中国魂》，见“China in Transition”《转变中的中国》，Tu wei-ming（杜维明）编，Cambridge, Mass. 1994，第180—180页。
- ③ 采用祝彦的德文翻译（有改动），见 Chinesische Lyrik der Gegenwart《中国当代诗歌选》，Lue Yuan（缘原），Winfride Woestler编，Stuttgart 1992，第161页。
- ④ 杨炼的《飞天》是1982年发表的《敦煌》组诗的第三首，德文由Andrea Wiehler翻译，见：Yang Lian, Pilgerfahrt（朝圣），Karl-Heinz Pohl（卜松山）编，Innsbruck 1987，第63—65页。
- ⑤ 德文由Karl Rospenk翻译，见：Rospenk, “Rueckhalt in der unscheinbaren Wirklichkeiten der Dichter Han Dong”（在平凡琐事中寻找支撑点——诗人韩东），刊于 Orientierungen 2/1994，第36页。
- ⑥ Charles Taylor（查理·泰勒），The Malaise of Modernity《现代的困扰》，德文版：Das Unbehagen an der Moderne, Frankfurt 1995，第101页。
- ⑦ 这首诗收入老木1985年编的《新诗潮选集》下卷，第575—576页。
- ⑧ Shang Zhongmin,《大学生诗派宣言》，见：徐敬亚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上海，1988，转引自Rospenk文，第35页。
- ⑨ 韩东对中国商业化的泛滥颇多批评，参阅Rospenk文第34—35页。
- ⑩⑪⑫ 查理·泰勒：《现代的困扰》，第93—104 98 104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煌）